

共同富裕视阈下联村发展模式创新

——基于甘肃C地和山西J地分析

郭晋萍¹, 曹斌²



(1.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太原 030024; 2.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以甘肃C地和山西J地为例,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阈下不同产业发展阶段联村发展模式的共同特征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当前各地联村发展模式具有镇乡引导、强村带弱村和联村党建的共同特征,但是受到产业发展不同阶段引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同诉求的影响,联村发展模式表现出明显差异,即处于产业成熟期的联村发展模式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都呈现较高的发展趋向,而处于产业投入期的联村发展在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较低。其原因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径;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联村发展的优先选项;联村发展延伸到乡村治理层面将会进一步保证决策民主性。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新之一,应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积极培育特色产业,强化党建引领,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从而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关键词:共同富裕;农村集体经济;联村发展;乡镇引导

中图分类号:F3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3)05-0129-07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有效激活农村各类资源要素,持续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壮大提质,创造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但是,据现有对全国10个省、308个行政村、3833户家庭的调研,按调查户计算各村的户均年收入,最高的10个村与最低的10个村户年均收入之比高达24.9:1;即使按户均收入最高与最低的30个村计算,二者之比仍然达到10.8:1,村庄分化现象已经相当严重^[1]。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长期以来各自为战的村庄很难满足村级资源、资金、人才、市场的多重发展要素需求,加之村庄空心化、过疏化、小型化的现实约束,单村发展模式日益面临重重考验,迫切需要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

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联村发展的趋势,引起学术届的广泛关注。这种新模式打破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区划、行业、所有制的束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资源重新调配,实现抱团发展,形成跨地域、跨隶属关系、跨所有制、跨行业的集体资产经营模式、产业联合发展模式和公共服务共享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2],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联村发展研究是近年来乡村发展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主要关注联村发展的必要性、作用、模式和路径等方面。一是在联村发展必要性。刘启英认为,乡村青年群体的不断外流致使村庄人口结构呈现出“空心化”状态,原来氏族和血缘维系的村庄集体意识逐渐式微,乡村治理的难度不断增加^[3]。田毅鹏认为,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乡村建设行动快速推进的大背景下,联村发展打破了

收稿日期:2023-03-08 DOI:10.13968/j.cnki.1009-9107.2023.05.13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23NFSB03);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郭晋萍,女,山西省乡村振兴局高级农艺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学。

单一村庄的发展模式,既保持村集体经济产权的独立性和连续性,又注重建立起村庄间产业、社会、文化发展的密切关联,实现新的历史条件下村落发展的“升级”^[4]。二是联村发展的作用。李冰等认为,联村党委通过先进村带动后进村,实现了经济与政治功能的双重发展与进步^[5]。高仓健等认为,针对村庄发展的过程中“发展不平衡,后劲不足,单打独斗多”等问题,“多村联创”让村与村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激活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克服发展后期的滞缓问题,有效推动乡村全面振兴^[6]。王美英认为,乡村基层党组织以组织结构调整和运行机制创新来破解乡村产业振兴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要素流动受制约等问题,通过内外联结的跨域市场和资源“外溢”推动乡村产业振兴^[7]。三是联村发展的模式。高仓健等认为“多村联创”是促进乡村内生统筹发展,推进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的现实路径,包含以土地资源、公共产品共享为主的资源共享模式,以地理位置互补、产业协同发展为主的优势互补模式,以“强村带弱村”、优化产业布局为主的抱团发展模式等多种模式^[6]。田毅鹏认为联村发展主要包括强村带弱村、联村党建模式、以乡镇为导引的多村联建模式、易地搬迁和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的联村行动模式等^[2]。屠霁霞认为“抱团发展”的经营新模式有利于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主要包括村村联合抱团发展、村企联合抱团发展、“飞地”抱团发展、单位包村帮扶发展等模式^[8]。

综上,目前已有研究认为联村发展模式既不同于“村庄撤并”,大多以党组织或地方政府牵头组织实现,不涉及行政区划的变动,对农村社会的冲击较小;不同于以华西村为代表的“村庄自我扩张”模式,不以生产要素和集体经济全面整合、集中经济决策权为必要条件,不重新分配土地人力等生产要素,能够保持现有村级集体经济独立。但是,总体来看已有研究的分析角度较为单一,缺少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联村发展模式的静态对比和探讨。研究方法主要局限为单一案例分析或工作报告模式,而案例剖析也主要基于同一地区的典型案例的深入挖掘,缺少对不同区位条件、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下,相同联村模式的普遍特点提炼和深入效用评估。本文通过对甘肃和山西处于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联村模式总结,可试图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

一、联村发展模式运行机制分析

本文所选案例甘肃 C 地和山西 J 地都采取了联村发展模式,但由于自然环境、区位条件、产业发展阶段不同,在基本条件、联村方式、联村特点、目标和机制上显现出较大差异(见表 1)。其中,甘肃 C 地属于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还处于投入期。采取以香菇种植起步早且产业基础较好的 M 村为主体,联合周边村庄共 10 个村,集体出资 473 万元成立 C 镇 M 村富民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简称“合作社”)的方式,强村引领弱村,共同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山西 J 地位于具备区位优势的城市郊区,产业发展处于成熟期。近年来由于煤炭资源枯竭急需转型发展,故采取了以 G 村为主,由 4 个行政村村级党组织,1 个煤矿社区党支部、1 个煤业公司党委组成联村党委的方式。发挥 G 村的龙头带动优势,以乡村治理为目标,融合发展、抱团振兴。根据调研显示,在联村发展模式运行机制方面,甘肃 C 地和山西 J 地具有以下特点。

表 1 甘肃 C 地和山西 J 地联村模式比较

联村因素	甘肃 C 地情况	山西 J 地情况
基本条件	辖区户籍人口 43 605 人,面积 203 平方千米	辖区户籍人口 11 425 人,面积 30 平方千米
产业周期	产业投入期	产业成熟期
联村方式	村村联合,集体出资,成立专业合作社	村、企、社区联合,成立联合党委
联村特点	农业种植业为主地区,组成“同质”	城郊型、工矿型、资源型村庄和地区,村、企、社区“身份多元”
联村目标	打造全县最大菌菜生产培育基地	村、企、社区均衡化发展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实地调研结果总结,下同。

(一)镇乡导引

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最基础层级,镇乡级政府服务水平是带领村庄发展、推进“三农”建设、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因素。镇乡级政府可以打破传统农村单村发展模式,突破各村集体经济的行政区

划、行业、所有制限制,以超越单个村庄的视野、层级来统一规划部署联村发展并敦促联村各村统一落实,成为跨村联合实践的导引者、规范制定者和监督者。

甘肃C地镇党委政府针对本镇距离县城较远、人均收入少、集体经济积累少、实力弱的欠发达地区实际,发挥镇政府的全面统筹作用,鼓励开展跨村联合发展专项行动。基于当地自然资源禀赋,明确以香菇种植为切入口,选取本地起步早并且选取产业基础较好的M村为主体,协调周边行政村共同参与,采取联村抱团的联村发展模式,打造“全县最大的菌菜生产培育基地”。

山西J地镇党委领导有力,针对辖区各村带富人少、党员年龄大带领群众增收致富难、各村单独发展空间窄、产业转型难等现实困难,选取产业发展特色突出并有发展集体经济潜力的“基层头羊”G村为中心建设联村党委。由镇乡统一协调采取“以点带面,整体推进,融合发展”方式,自上而下强力推进村村联建、村企联建、村社联建。

(二)强村带弱村

联村发展打破单村点状发展模式,转变为多村块状发展模式,但由于各村基础参差不齐、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联建时各村发展并不平衡,必须发挥强势村、主体村在多村联创的过程中发动机、引擎器的作用。通过村村、村企等联村发展,打通资源、资金、信息、人才等要素流通渠道,强化主体间紧密合作和资源共享,提升各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实力^[9]。

甘肃C地地理区位不佳、自然禀赋较差。凭借M村在香菇产业方面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优势因地制宜规划联村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模式。M村吸纳弱村共同组建了农民合作社,集中使用世界银行贷款和各级财政配套资金,提升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弱村可根据出资比例获得相应出资返还,据统计每年每村可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约9万元,显著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村集体发展。

山西J地各村煤炭资源面临枯竭,处于产业发展转型期,经济基础相对充裕且各村转型方向不同,优势产业大相径庭且难以在产业方面形成合力,但对于构建和谐乡村具有较强的共同需求。G村在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Z带领下,先后获“全国乡村治理建设工作示范村”“全国文明村”等6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具有以先带后、以富带贫、以稳治乱的实践经验。J地充分发挥强村对整个村社关系网络的谈判力和动员力,采取强村引领、多村资源整合、经济能人带动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以强村资源辐射改变村级之间发展不平衡状态,有效地解决薄弱村产业发展水平低、乡村治理水平低等长效发展难题。

(三)联村党建

联村党建作为一种党组织合作方式的机制创新,是联村发展模式的主要推动手段,为联村发展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党建作为核心引领力量,拥有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权威和区域资源统筹能力,在联村发展模式下可以实现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推动联村发展区域在显性利益整合、隐性社会关系整合和共享制度整合。

甘肃C地开展以农民合作社为载体的联村党建。坚持“合作社建在哪里、党的组织覆盖到哪里、党的工作开展到哪里”,发挥党支部在产业发展中的“主心骨”和引领作用,在合作社成立党支部,将有种植经验、发展意愿的20名年轻优秀党员聚集到产业链。创立“党员能人组团结对帮带”模式,设立党员先锋岗3个、示范岗5个、责任岗12个,要求党员承担产业投入期的沉没成本,分担技术风险,鼓励其优先掌握香菇种植技术,并在菌棒生产、香菇种植、技能培训、运营管理等环节承担相关管理职责,促进了特色产业快速壮大、集体收入有效增加、集体成员共同富裕。

山西J地要求党员统一思想,携手推进产业转型和乡村治理工作,集中挂牌联村党委,突出党建联抓、治理联促、人才联培、发展联动、资源联享、服务联心“六联”模式,统筹村庄建设、土地流转、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配套等,变各村“单打独斗”为共赢发展,实现了联建村资源效益最大化。联村党委坚持在发展思路上引导,在发展模式上创新,在基层治理上借鉴,在发展经济上互助,在乡村振兴上共促;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共同研究党建工作,共同开展党建活动,共同交流党建经验。联村党委各村党员在每年“七一”、9月9日、12月26日组织开展三次集体活动,增强党员之间的联系,提升党员活动的影响力。从成效来看,J地联村党委成立

以来,一是实现了乡村治理制度共享,复制强村乡村治理经验,完善村规民约、自治章程,促进乡村治理和谐稳定。二是实现了基础公共服务共享,如篮球场、室内文体活动室等休闲设施在联建村之间的共享。三是实现了民生福祉共享,如村民、社区居民、矿区居民在就业、上学、就医、美丽乡村、社区、矿区建设等方面初步是实现了信息和资源的共建共享。四是实现了产业发展共享,如就业信息、产业体制扩容等方面实现了共同发展。

二、联村发展模式的差异性比较

联村发展模式是解决单村集体经济发展困境、促进区域共同富裕的组织模式创新。考察联村发展模式效益,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关于共同富裕理论,郁建兴等认为共同富裕需要体现发展性、共享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统一,其中,发展性强调经济增长,共享性强调共同、公平,可持续性则强调发展和共享的可持续性^[10]。具体而言,发展性是指狭义的发展,主要聚焦于经济总量增强能力,从物质角度衡量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共享性包括共同和公平两个层面,共同层面侧重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全面高质量发展,公平层面侧重完善分配机制,扩大中产阶级;可持续性指经济社会发展运转良性可持续,具有内生发展动力和能力,不依赖政府等外力支持。下面从推动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同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四个维度出发,对两地混合联村发展模式效益进行比较分析。

(一)发展性比较

发展性方面,甘肃 C 地、山西 J 地两种联村发展模式都有较好表现。其中,甘肃 C 地以乡镇为主导引导各村以土地、资金等入股建设合作社、种植基地发展联村农村集体经济。在 M 村等 5 村开展香菇基地建设,吸引集体成员种植,打造标准化程度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强的利益共同体,逐渐形成了资源共享、风险共担、市场竞争力强的菌棒大规模生产产业集群。短短的 5 年内实现了本地区香菇产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转变。特色产业快速壮大也促进了集体收入有效增加。调研显示,以年生产 150 万棒香菇菌棒为例,每棒销售价格 4.3 元,年销售收入为 645 万元;扣除成本 492 万元,年纯收入为 153 万元;按纯收入的 60% 返还各村集体经济组织核算,每年可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91.8 万元。

山西 J 地联村党委统筹村庄建设、土地流转、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既基于既有产业优势发展第二产业,又创新探索向第三产业延伸,促进各村以 G 村为中心在强村、能人的带动下合作发展果蔬种植、生态采摘、乡村旅游、教育培训、铁锅铸造、免烧砖生产线项目等,形成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各村品牌特色鲜明、集体经济发展态势强劲的活跃局面,构筑了“壮大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集群和产业板块,获得了超额收益。J 地 2022 年仅 G 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就超过了 300 万元,其中承接各类培训班 45 期,实现收入 150 万元。

(二)共同性比较

共同性方面,甘肃 C 地、山西 J 地都是地域临近区域的跨村联合,在辐射带动村集体数量上都相对较少。但在共同富裕共享的领域和维度上甘肃 C 地明显低于山西 J 地。共同富裕的共享既包括集体经济发展给村民带来的收入,也包括村民在公共服务上的共享,并且公共服务共享程度受限于集体经济发展程度。

甘肃 C 地受限于产业发展基础,联村目标主要集中于打造特色产业,联村模式所建立的社会化服务机制主要聚焦在合作社香菇产业上,侧重香菇标准化种植,实施统一规划、统一采购、统一招标、统一建设、统一标准生产、统一收购、分级销售的“六统一分”模式,为成员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主要解决集体成员的香菇生产和销售的后顾之忧。

山西 J 地联村目标虽有解决产业转型的问题,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广泛共享。挂牌联村党委,构建 6 个网格党支部、8 个网格党小组、19 个党员中心户,实现了 3 100 户居民的党建服务全覆盖。联村范围内服务性设施如党群服务中心、一站式服务大厅、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社会工作室、社区议事厅以及各种文体娱乐室完备,在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保障完善,如为 60 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金、代缴

医保金,实现了资源与服务的充分共享。同时J地村、企、社区“身份多元”的联建天然也带有促进城乡融合、缩小城乡差距的共同特性。

(三)公平性比较

甘肃C地和山西J地均考虑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差距,通过利益联结分配机制规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局面,在公平性上处于较高水平。

甘肃C地通过镇乡导引,合作社制定多元利益联结机制的方式增加村民多元收入,就业优先倾斜脱贫户,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一是增加了成员收入。集体成员按照每棚投入约7500棒,每棒产香菇0.75公斤,年收入约1.6万元,通常夫妻两人可以承包2个棚,即每年收入可突破3.2万元,远高于外出打工。另外,合作社建立的菌棒厂,优先吸纳建档立卡脱贫人员在车间工作。在生产线上设置务工岗位36个,出菇基地带动24人就业,人均收入达到1.5万元以上,对于解决脱贫户持续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规定主要按照惠顾额返还,鉴于香菇级别差异将会导致价格差异,合作社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把成员交售的香菇总额按照一等菇30%、二等菇40%、三等菇30%比例计算返还金额,并同时提供技术服务帮助成员提升。三是建立有效的监管制度。合作社每年委托第三方审计部门对合作社财务进行审计,并且在村委会张贴审计结果,让成员监管,充分赋予成员知情权和监管权。

山西J地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按照“行政区域、自治主体、资产产权‘三不变’,规划、部署、落实‘三统一’,建账、核算、管理‘三独立’”的要求,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联村党委成员分工负责、定期联席、轮班办公、民主议事、民主监督、联动攻坚等制度。对涉及土地征用、项目实施、资源处置等重大事项,严格按照相关联建村提议、联村党委会议动议、乡镇党委审核复议、各联建村“六议两公开”“联村党委”形成决议的程序民主决策,做到以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保证村集体经济之间收益的公平性。

(四)可持续性比较

甘肃C地联村发展模式主要为了解决产业发展初期沉没成本较高的问题,但由于市场风险的不可控导致该模式自身面临的风险较大而可持续性较低。山西J地联村发展基于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可持续性较高。

甘肃C地主要依靠吸引财政资金,以完善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特色菌菇产业,村集体经济收益对政府依赖性强。合作社成立以来成为C地重点项目,吸引了大量财政资金快速完成了基础建设。2018年获得世界银行贷款458万元,国内财政配套资金322万元。2019年获得世界银行贷款和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89万元,在M村流转土地55亩,建设菌棒生产车间、拌料场、冷藏库和香菇生产基地,并且修建香菇种植大棚30座。2021年再次获得财政支持532万元,收购香菇大棚56座和冷库3间,初步形成了年产150万棒的产能。由于C地仍局限于第一产业生产领域,产品附加值低且香菇供给总体过剩,市场价格波动较大^[11]。因为财政资金以扶持固定资本为主,但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更多需要短期流动资金支持,而脆弱的镇乡经济难以支撑合作社采购资金,会导致村集体经济在内生发展能力上存在极大的短板。

山西J地城郊联动、村企共建,从形式上打破村与村之间、村社之间、村企之间组织建设“壁垒”,将联建村、企业优势“统筹”“捆绑”,整合使用,优势互补,释放“1+1>2”的活力。加之自身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村庄精英,J地在以强带弱的过程中实现了联建各村都有产业有品牌、都有优越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较高的风险防范能力,进而保障村集体经济收益的持续增长。2022年,J地4个村集体经济收入分别在200万元、150万元、90万元和40万元以上,集体经济发展强劲。当然,必须注意J地村庄精英担任抱团项目运营公司的高管所带来的政治风险。

(五)综合比较

通过上述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甘肃C地和山西J地两地联村发展模式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各有优劣。其中,甘肃C地还处于产业发展投入期,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加之产业发展资金来源于世界银行贷款和财政扶持,受制于外部压力需要,建立了公平公正的组织体系。相对而言,山西J地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更加重视乡村治理,在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方面更为重视共同性和可持续性,相关制度建设有效保证镇域范围内的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增长。深入比较分析还发现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个地在联村发展上呈现不同发展状态(见表2)。

一是在共同富裕视阈下,从产业发展到乡村治理的全领域发展是联村发展的必然路径。虽然受发展阶段限制可以优先实现产业联合,但联村模式的最终形态必然是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全领域的联村发展,只有这种联合才是对促进农民共同富裕最有意义的联合。产业发展由投入期进入成熟期以后,是否停留在镇乡引导依靠政策层面、是否能够因地制宜的及时调整联村党建工作方向、是否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全领域联村发展将成为决定模式共同富裕效益的关键因素。

二是侧重产业发展是条件受限地区联村发展的优先选项。甘肃 C 地在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受限条件下,优先发展产业,有效带动乡村集体经济迈出从无到有的跨越式发展。虽然阶段性呈现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共同性、可持续性“低”的状态,但对资源条件和发展基础一般地区开展联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说明联村发展模式需要因地制宜。而山西 J 地处于产业成熟期,虽然也采取了联村发展模式,但目的是为了改善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基础,在共同性和可持续性方面呈现出更好的评价结果。

三是联村发展延伸到乡村治理层面将保证决策民主性。山西 G 村首创“六议两公开”模式,明确村级重大事务采取由村民小组提议、村党支部初议、村“两委”商议、驻村干部参议、村“两个代表议事会”评议、村民大会决议议事过程公开、议事结果公开。这种机制倒逼全体村民参与、全民决策包括产业发展在内的各项联村事务,保障了决策民主性。甘肃 C 地由于要发展产业,在提升决策效率的同时,难免在个别场合要忽视部分成员的意见,决策民主性方面略有不足。

三、促进联村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的两个案例的对比,阐明了联村发展模式是提升村庄组织化的模式创新。在分阶段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下要真正发挥联村党建作用,提升村庄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推动乡村振兴,建议如下。

(一) 提高发展性,培育特色产业

以乡镇作为平台,立足本乡镇产业定位和发展方向,统筹利用各村集体的资源禀赋,协调各村集体经济联合发展,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规模优势产业。充分考虑农户的意愿、劳动能力、投入水平、土地资源等条件,因地制宜精准合理确定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方向。发展模式要兼顾短、平、快增收项目与长远持续产业,以发展差异化的特色产业解决短期增收和长期巩固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二) 提高共同性,强化党建引领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不断丰富联村党建在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上的有效举措,通过资源整合、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以联村发展模式高组织化程度推动资源融合,形成对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各项事业等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的更高层级力量。联村运行机制实现党建工作联抓、基础设施联建、产业发展联兴、矛盾化解联调、公共服务联动、发展利益联享,促进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和农民富裕。

(三) 提高公平性,完善村域利益共享机制

以共同富裕作为联村的价值基础,完善联村发展的规范流程、利益分配、制度安排和相关支持政策,推动农村均衡协调发展,带动各村整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致富,促进联村各村社会共治、发展共建、成果共享。避免在联村发展过程中因处置不当造成对联村发展村级主体和农民利益的损害。要注意引导联村发展中各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要通过对弱势村民补助、社会保障以及分红等再分配形式,保障村民收入的均衡性。

(四) 提高可持续性,激活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

要注重集体经济内生发展能力的开发,推进资源统筹、合作打通、人才进发,不仅仅依赖于上级财政资源

表 2 共同富裕视阈下两地联村发展模式的比较

对比内容	甘肃 C 地	山西 J 地
发展性	高	高
共同性	低	高
公平性	高	高
可持续性	低	高

“输血”为村集体经济收益提供保障。一是拓展合作深度,实现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横向联合和联村集体经济组织与集体成员之间的纵向合作,提高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竞争力,构建更深层次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二是挖掘内部潜力,实现联建村内部干部队伍人才资源共享,并把农村中的致富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农民和经营管理能力强、乐于奉献自我的年轻人充实到联村发展队伍里。三是防范化解风险,完善联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建设,规避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市场、政治、环境风险,实现长效发展。

参考文献:

- [1] 杨宗辉,魏后凯.推进联村发展,筑牢共同富裕基石[J].农村工作通讯,2022(06):29-30.
- [2] 王曙光,郭凯.农村集体经济的减贫效应与内在机理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19(11):3-9.
- [3] 刘启英.乡村振兴背景下原子化村庄公共事务的治理困境与应对策略[J].云南社会科学,2019(03):141-147.
- [4] 田毅鹏.“联村发展”:乡村振兴推进的新趋向[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15):32-38.
- [5] 李冰,岳春宇.创新社会治理中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93.
- [6] 高仓健,冯相龙,顾莉莉,等.“多村联创”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与启示——以浙江省安吉县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21,49(13):256-259.
- [7] 王美英.联村党建引领乡村产业振兴的实践机制——以福建省将乐县高唐镇常口村的“1+X”联村党建为例[J].农村·农业·农民(B版),2022(05):34-36.
- [8] 屠霁霞.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1,29(01):42-48.
- [9] 咸鸣霞,周义程.市场合作、民间协调与基层党组织资源整合模式创新——基于联村党建实践案例的类型学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05):90-98.
- [10] 郁建兴,任杰.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政治学研究,2021(03):13-25.
- [11] 曹斌.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香菇消费市场发展特征与趋势[J].食用菌学报,2023,30(30):28-40.

The Innovative Mode of Village Alliance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Site C in Gansu and Site J in Shanxi

GUO Jinping¹, CAO Bin²

(1. Shanxi Rural Revitalization Bureau, Taiyuan 030024;

2.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aking site C in Gansu Province and site J in Shanxi Province as typical cas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village alliance modes in diffe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tages under the vis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s in various regions share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ownship guidance, strong village leading weak village, and the Party building of village alliance. However, influenced by different demand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triggered by different stag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velopment, commonality, 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Specifically, 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 in the mature stage of industry all shows a high development trend in development, commonality, fairness and sustainability, while the village alliance mode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 investment shows lower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mmon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e reason 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field fro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rural governance is the inevitable path for the village alliances; focusing o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s a priority option for the village alliances in areas with limited conditions; rural governance of the village alliance will ensure democratic decision making. It is suggested to take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goal, cultivate characteristic industries, strengthen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building, improve the village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and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he collective econom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village alliance; township guidance

(责任编辑:王倩)